运往山底。

给巨石翻身。

初步“瘦身”

运往火车站时，经过桥梁。

经过王家麦岛。

到达辽宁路。

送上火车。

亲历者说

那些画面，让我终生难忘

马承彬与纪念碑合影。

马承彬接受采访。

年轻时的顾广援

顾广援接受采访。

马承彬，91岁，时任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毒品（危险品）队工会工作人员（后为主席），将珍藏的碑心石运输工具捐赠给道路交通博物馆。

顾广援，88岁，时任《青岛日报》记者，先后三次前往现场采访，见证了采石、搬迁过程，1953年8月31日报道了石料已在浮山开采完毕的消息。

在松岭路家中，同行前辈顾老给半岛记者讲述了他采访的过程，对于他来说，这次采访改变了他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。“我当年在《青岛日报》跑工业交通部，工作了不到一年，就接到了浮山采石的采访任务”，顾老说，他祖籍山东蓬莱，到青岛来求学，在青岛一中毕业后，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，因为他擅长绘画，所以成为学校的宣传骨干，因为表现突出被《青岛日报》选拔当上记者，一干就是40多年。

当年他20岁出头，涉世未深，开始还不太理解采石的意义，只知道采访的地点离单位很远，是个“苦差事”，“当时的市区道路就到台东，我骑着天津飞鸽牌自行车，前半段路很平坦比较顺利，到了后半段就得骑一段走一段，甚至得扛着自行车走了”，1953年青岛的道路还没通到浮山，路上崎岖不平，顾广援到达采访地点要花费3个多小时。

“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其实采石的石匠们也不太明白他们的任务，常年与山石打交道，石头对他们来说早已不足为奇”，顾老说，后来经过宣传讲解，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使命。而对于顾广援来说，也是一次精神上的升华，他这才知道自己这次采访根本就不是“苦差事”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“当时的工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，没有先进的设备，全凭简单的钢楔子、钻头等简单工具和高超的采石技术”，顾老眼看着他们将厚厚的一层“石皮”起下来，再根据图纸长宽开出一人多深的石槽，“最难的是起抬，就是把石头从山上起下来，老师傅带着徒弟一起喊着口号，凭借丰富的经验，一点点地将石头凿了下来，很不容易。这个过程不能有一点闪失，否则会很危险，如果一不小心毁坏石头，就会前功尽弃”。

烟尘滚滚，口号声声，顾老脑海里定格了这个画面，“我还跟着他们一起喊号子，有时候也帮忙抬”。工人们凭借愚公移山的精神，终于将山石起了下来，并一点一点地运到了火车上。

在同乐三路马承彬先生家中，半岛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九旬高龄的马老，他精神矍铄，回忆目击碑心石搬运过程，思路清晰。作为起重队的工会工作人员，马承彬的任务是关注工人的生活状态，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。他说，下工地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，所以他目睹了碑心石的搬运过程。

“搬运石头使用了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滑运，就是底下铺道轨，顶上放上槽杠，里面放上黄油，扣在道轨上，搬的时候能轻快一点，拖到下面石材加工厂进行初步加工后，再运输就使用滚运了。工人分工明确，有专门修补道路的，因为当时道路很窄，且多为土路，需要边走边修；有专门搬运滚木的，山石下面都是滚木，工人用借来的唯一一辆拖拉机用钢丝绳拉，走一段就将倒出来的圆木铺到前面，一点一点地挪，一天最多也就拖个五六百米；有生活组，专门负责搭帐篷和伙食，当时工人都吃住在工地，天黑停工，天一亮就开工，非常辛苦”。

让马老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碑心石下山的时候，要进行180度“翻身”，难度系数很大，工人们费了很大劲才成功。

巨大的山石缓慢地向京城移动着，经过了麦岛、辛家庄、浮山所等地，直到登上火车。马老说，这一路上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，让他感动的是路上的居民都很配合。“经过麦岛的时候，有一户农房碍事了，石头实在转不过弯儿来，经过和当地农户的商议，农户立刻表示可以拆掉房子，甚至说不要补贴；其实不光是这个，当时运石用的托木，是到五莲县找的，五莲县有百年柿子树，木质硬度大，抗压能力强，工作组提出购买，当地农民听说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做贡献，当即说将木头献给国家，不要一分钱”。

纪念碑碑心石背后，跳动着许多颗澎湃的爱国心。

“运输碑心石的火车皮实际上是从东北的小丰满发电厂专门调来的”，马老还回忆起路上的一次惊险遭遇，“当时青岛到北京的火车，要在德州换火车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火车司机没有控制好，把车厢给撞出了10来米，山石也重重地撞了一下，这下大家都很紧张，好不容易运到这里了，别再出什么差错。为了测验石头的状况，立刻给山石洒水，停一晚上，等干了看是不是有裂缝，幸亏山石完好，这才继续前行”。

马承彬很有心，将当年运输的工具保存了下来，并把它们全部捐赠给了道路交通博物馆，“它们是人民英雄纪念碑‘青岛心’最好的证明”。

传承者说

提起父亲，我们倍感自豪

侯永梅、李玫、董双莲、邵世珍

纪念碑搬运工具。

刘增平接受采访。

在道路交通博物馆，半岛记者见到了当年参与搬运工作的工人后代，她们分别是董传祥的女儿董双莲，邵立德的女儿邵世珍，侯元祥的女儿侯永梅，以及李凤枝的女儿李玫，她们中最小的58岁，最大的65岁，从小都是听父亲的采石故事长大的。

“我们的家离得都很近，父亲经常聚在一起聊天，我们最喜欢听他们讲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。二两酒，几碟小菜，他们便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经历，我们几个坐着小板凳，支着下巴听，听得津津有味”。董双莲说，父辈们特别能吃苦，他们都来自日照，当年在码头拉洋车，后来拉地板车，就这样凑在一起组成了搬运队，后来扩大为起重队，他们吃苦耐劳，“这么说吧，在山东都很有名，因为没有青岛起重队干不了的活”。

正因为父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了碑心石运输队的一员，提起往事，因为运输工具简单，确实很难，但他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，作为女儿，她们有赞赏，也有羡慕。所以，她们都顶替接班，进入了起重队，如今，她们中的多数都是起重队的退休职工，继承了父亲的衣钵。

“父亲参与采石工作时，我的大哥才几岁，二哥刚出生不久，父亲常年在工地一两个月不回家，全靠母亲操持家务。”李玫说。这些工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，不但要成分好，还要有技术，脑子灵活，光有力气不行，他们吃住在工地，一个帐篷，一张草席，甚至一件蓑衣铺在地上就是他们的床，凭借着这种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，才一点一点将碑心石安全护送到北京。

交运集团青岛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刘增平全程参与了道路交通博物馆的兴建，他说当年的搬运者就是交运集团（青岛）的前辈们，他的父亲便是搬运队中的一员，所以，他带领工作人员对纪念碑碑石搬运过程的物件进行了抢救性收集，包括马承彬先生捐赠的运输工具等，成为交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“我们需要让青岛人都知道，原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一颗‘青岛心’，这是青岛的荣光。”刘增平先生说，当年没有机械化，前辈们用最原始的搬运方式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他们所承受的压力，经历的艰难，是现在无法想象的。但“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用一种‘红石’精神，一种坚韧不拔的韧劲，一种敢于担当的责任和使命感，演绎了这个城市的家国情怀。他们都拥有忠诚的信念，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心潮永远是澎湃的”。